

◎创作谈

# 领生活之命

乔叶

## 从“泡村”和“跑村”而来

我的长篇新作《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讲的是太行山深处一个叫宝水的村子,如何从传统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名单。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想到创作一部反映新时代新山乡、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的作品。前些天开研讨会时,评论家李国平说:《宝水》的诞生是领生活之命、文学之命、寻找文学新资源之命。这样的理解非常精准。我创作这部作品的个人自觉与时代文学命题的邂逅,如同山间溪流汇入江河,某种意义上造就了作品的际遇。对于这种际遇,我从来不退避。但既已邂逅,也不回避。

《宝水》从动念到写成用了七八年时间,事实上可能更久。之所以用这么长时间,可能还是因为我太笨。写一部与老家和乡村有关的小小说,对我而言非常难。

难处很多,难以备述,难的类型也有多种。写作前的资料准备和

驻村体察,写作时的感性沉浸和理性审视,初稿完成后的大局调整和局部精修……还有在前辈的乡村叙事传统中如何确立自己的坐标,这都是难点。可以说,纵也是难,横也是难,朝里是难,朝外也是难。还真不好比出一个最大的。或者说,每一个都是最大的。因为克服不了这一个,可能就没办法往下进行。比如说,对这个题材的总体认识就很难。为什么说写当下的乡村难?因为这个当下的点正在跃动弹跳,难以捕捉。也因为很少有现成的创作经验可资参考。

但说难其实没多大意义,一旦选定了,就只有面对这难。对这些难点,除了耐心去面对,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比如“泡村”,即在老家选两三个村子长期体察。比如“跑村”,即尽可能地去看更多的乡村样本。

趁着采风的机会,全国各地的村子我跑了不少,二三十个肯定是有,没细数过。其实走马观花的见闻都进不到这个小说里,但我觉得确实也有必要。因为能够养一股底气。看得越多越有底气,这会让我踏实,让我能确认宝水不是众多乡村中唯一的个例,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乡村。即便和那些发展相对迟滞一些的乡村比,它作为一个发展得比较快的新乡村,也是有意义的。

## 回归隐秘的精神原乡

《宝水》这个新长篇,对我而言,其实是个回归之作。

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乡村孩子,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回了豫北老家乡下教书,4年后被调到县城工作。几年后又调到郑州,直至两年前来到北京。迄今为止,乡村生活在我的生命长度中所占的时间份额约是1/3,都浓缩在20岁之前。随着离老家越来越远,我对家乡的认识和理解也有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

在河南文学谱系中,乡土写作传统有强大的力量。或许有点叛逆,我年轻时特别不喜欢乡土,极想逃避乡土文学这个概念。不认命,总是试图与之保持距离,甚至反抗。约10年前,有评论家曾说,不少前辈作家都有或是曾有过自己的写作“根据地”,也可称为地缘上的“原乡”,将之视作精神上的源脉或感情上的情结,甚或演变为创作中的一贯风格和手法,比如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苏童的枫杨树。他们通常有一个或数个精神原点,或是相对固定的写作地域。这位评论家进而问我:在你的作品中并没有看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情结或地域元素,你内心有没有一个潜在的写作生发地,或是说



隐秘的精神原乡?

没有,在这方面我没有明确意识。我当时很决绝地这样回答。还分析了原因说,这应该跟生活背景和成长环境的差别有关。许多前辈的乡土记忆完整坚实,成了他们的一种习惯性资源。他们建立的文学世界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记忆的影响。相比之下,我们这代人的漂泊性和无根性更强一些,一般没有长期的固定的乡村生活经验,写作资源相对来说零碎一些,当然也可能更多元一些。

但其实,怎么可能没有呢?只是彼时不自知。不过没关系,时间会让你知。这么多年过去,悄然回首,发现自己的小说写作有了两个方向的回归。一是越来越具有乡土性。作为一个河南籍作家,虽然已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但地域视野的多维度似乎让我的乡土性更鲜明了。二是越来越女性化。之前我还不时有男性叙事视角或中性叙事视角,如今几乎全是女性视角。身为女作家,进行女性化写作似乎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原点选择,可对我而言却是一种返航。

回头盘点一下,《最慢的是活着》可以算作比较明晰的回归标志,接下来的几个长篇,《折楼记》《认罪书》《藏珠记》都有乡土背景,且也都是女性视角。还有些中短篇小说亦如是,如《旦角》《雪梨花落泪简史》《玛丽嘉年华》《给母亲洗澡》《叶小灵病史》等,其中《叶小灵病史》和《宝水》有一个参差对照的关系。叶小灵的“城市梦”发生在城乡之间鸿沟巨大的上世纪末,讲述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被实现”后,精神突然落空因而无处安放的故事。新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迅猛,想不被城市化都很困难,有意思的也许该是“乡村梦”。

## 感知新与旧的相依相偎

“作为作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乡



乔叶

郭红松绘

村世界。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去分析,还是从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来观察,一种新的乡村,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未有过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深合我心。《宝水》写了村庄的一年,是个横切面。横切面意味着必然什么都有。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植物学的,等等,乡村的复杂性必然携带着这些。在驻村采访过程中,我确实能鲜明地感受到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多元力量:乡建工作者、支教大学生、村里的第一书记等,这些力量通过各种方式作用到农村,使得乡村之变成一种非常鲜活的状态,这种鲜活使得我无法简单地褒贬或明快地判断,这一切在不断突破我固有的写作经验。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在书房里架空想象是多么荒唐。

新固然是新的,但看到有媒体在采访时用“呈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乡村”来评价《宝水》,我只有敬谢不敏。小说里有新时代乡村的新风尚和新特质,但这新也建立在旧的基础上。在江南采风时我就发现一根很有意思的事:那些富裕乡村的祠堂都修得一家比一家好。宗祠的存在就是典型的旧,却能和完美融合,而新旧的彼此映衬也让我觉得格外意味深长。我认为,写乡村一定要写到旧的部分,那才是乡村之所以为乡村的根本所在。正如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乡土中国,那一定是因为乡土性如根一样深扎在这片大地上。

新时代的乡村固然有新,但旧也在,且新旧是相依相偎、相辅相成的。新有新的可喜,也有焦虑和浮躁;旧有旧的陈腐,也有绵长和厚重。我不崇拜新,也不崇拜旧。我在其中不会二元对立式地去站队。如果一定要站队,我只站其中精华的、美好的部分,无论新旧。

于是就不给自己预设,只是去跑村和泡村,只是去沉浸式地倾听、记录、整理和选择,然后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遵从内心感受去表达。在这个过程中,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缺一不可。我个人的体悟还应该加上一点听力——像特工一样潜伏在村里,“窃听”人们藏在深处的微妙心事,这样才有可能和他们同频共振,同悲共喜。如此一来,时代这个原本很宏阔的词,竟然让我慢慢觉得具体可亲。甚至可以说,它就在宝水这个既虚且实的小小村落里,正如滴水藏海。

(作者系北京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 爱心汇处 幸福花开

——读何南《微笑的格桑花》

邱华栋

读何南的长篇纪实文学《微笑的格桑花》(青海人民出版社),颇感意外。我读过何南的多部小说,均以关心农村、关心留守儿童为故事发生地。这次,他赴高原采访,将目光投向一群藏族孩子,将笔触伸到遥远的青海玉树,我不由得对他又多了些了解。《微笑的格桑花》传达了这样一个观念:藏族孩子身上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细胞,如果有人能加以唤醒,他们必将不负众望;如果有一个契机倏然降临,他们身上的才情必会光华四射。而支教老师陈有龙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和玉树的“相遇”,就是孩子们发光的契机。陈老师以“大唐画室”为主阵地,以丹青为媒,让孩子们战胜了自卑,笔下绽放出艺术之花。

何南用平实、细腻的笔触,为读者讲述了陈有龙老师是如何来到玉树,帮孩子们实现艺术梦想的故事,更“复盘”了孩子们如何充分挖掘潜力,最终在国际国内美术大赛上崭露头角到频频获奖的传奇。个中艰辛与收获、眼泪与花束,随着生活的跌宕而起承转合,自然是山重水复后,柳暗花明时。

掩卷而思,《微笑的格桑花》触及到文化扶贫这个大命题。“贫穷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以为命中注定贫穷或一定老死于贫穷的思想。”富兰克林的话深中肯綮。对于贫穷,中国正视它且决心改变它,于是有了脱贫攻坚的全国一盘棋。文化扶贫是扶贫的一部分。为此,从国家的顶层设计到中国作协的工作方向,都可见到“文化扶贫”这个“关键词”。如《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中国作家》《小说选刊》和中国作协网等都开设了主题专栏,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丛书”等,使一大批优秀作品得以涌现。

以孩子为主人公或孩子本身就是作者的作品自然也很多,我较为熟悉的就有《雪莲花》《逐光的孩子》《沙漠小球王》《大山里的小诗人》等多部。孩子的心灵是最纯净的,与孩子有关的文化扶贫才是扶贫之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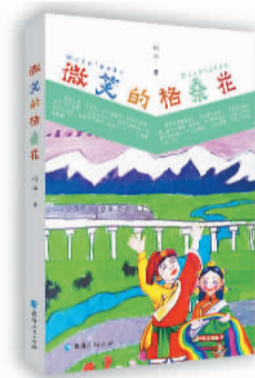
在《微笑的格桑花》里,我们看到,陈有龙老师和藏族孩子们的成功既不一蹴而就,更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唐画室建立之初,由于没有学

生,只能由班主任推荐。但一开始,这些孩子来画室美术受到科任老师或家长的阻挠。对此,何南在书中写道:“陈有龙老师和多杰才仁老师也明白,因为不是小升初的必考科目,学习美术,短时间内的效果是黑白,没有人知道。太阳出来了,雪会融化,草会发芽,人会温暖;格桑花开了,你能看到它们或白或粉或红或紫的笑脸,能嗅到它们的芳香,但学美术的效果怎样,没法验证。”

他们还面临着桌椅短缺、没有画具、看不到出路的尴尬。所幸,在学校、教育局、基金会和州两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他们最终克服了困难。在陈老师和孩子们看来,“梦想长着神奇的手,牵引着人去努力;梦想是个魔术师,能变出奇迹。”画家梦,是大唐画室的孩子们亲近艺术女神的动力。何南告诉人们,对这些家境困难的藏族孩子,“放弃就废了,重视就开了,有爱就贵了,有理想就飞了。自从小小的他们和大唐画室有了美丽的相逢,一切都变了模样:他们告别迷茫,面前延伸出一条路,两边开满鲜花,沿途蜂蝶飞舞,这条路一直通到魅力四射的艺术殿堂”。

在藏语里,“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格桑花也叫幸福花。何南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像陈有龙老师这样的人很多,他们都像极了格桑花,不惧挫折,追逐梦想,珍惜生命,创造幸福,为此而不遗余力。尤为可贵的是,何南的《微笑的格桑花》是以爱为基点的写作,是作家责任感的体现,也是文学的温度所在。在这个角度下,《微笑的格桑花》又多了一层意义。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 《坪上村传》：描摹一个村庄的时代变迁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湖南省作协主办的彭东明长篇小说《坪上村传》研讨会举行。《坪上村传》是作家彭东明献给故乡的一部作品。在外漂泊38年后,作家因回乡修缮老屋,重新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新农村新气象更吸引作家重新打量这片久远的故土。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认为,《坪上村传》书写了一个村庄几十年的记忆和历史,解读这部作品,不能只从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更要将它放置在脱贫攻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个巨大的

时代背景中。作为小说,《坪上村传》为一个村庄立传,整体上具有虚构品格,但同时也有非虚构的品格。作者的在场让读者能够强烈感觉到这个村庄不仅仅是被回望着的,也是在进行时的、是“敞着口”的。这部作品启示我们要在动态变化中认识乡村,在已经逝去的历史与我们正在展开的活生生的生活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情感与伦理关系。

与会专家认为,作者绘就了一幅现代乡土人物图,由此可见坪上村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感知鲜活的、与农事直接相关的村庄生活和民俗,领略古老村庄的蓬勃生机。同时,该书也是一部文学化的村史村志,从回望的角度写出了历史长河中村庄的变化,写出了乡土元气,为当下乡村振兴的书写提供了参考。

谈及创作缘起,彭东明说,自己重返家乡后,用5年时间将一栋200多年历史的老屋修缮成一座书院,又花3年时间写成了《坪上村传》。这片土地上的百年变迁给了他写作的力量,小说的每一句话都只有在这片土地上才能生长出来。

## 全国重点网络文学网站联席会议召开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张明瑟)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在京召开全国重点网络文学网站联席会议,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部署2023年网络文学工作。来自50家网络文学网站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介绍了2023年网络文学重点工作,包括举办系列专题培训班、改稿班;发布网络文学选题指南;扶持重点创作项目;加大现实题材创作引导力度;实施网络短剧创作计划;召开全国网络文学工作会议,加快筹备成立中国网络作家协会,完善重点作家联系制度,建立重点网络作家数据库;开展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系列

调研;开展网络文学界普法维权和权益保护;强化评论研究和推介表彰,发布《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举办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实施网络文学理论评论扶持计划、“网络文学阅读计划”;办好第二届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推动中国网络文学“Z世代”国际传播,推出《文学中国》访谈栏目;做好“网文视界”新媒体运营工作等。

各网络文学网站负责人围绕新一年工作建言献策,就打击侵权盗版、规范内容审核、现实题材IP改编、网络文学推广平台和机制建设、“网文出海”等工作进行了讨论。

## ◎新作评介

# 由外向内的突围

——读许春樵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

张文林

许春樵的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既延续了他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立场与先锋小说叙事风格,又实现了由外向内的成功转型与风格演变。这部作品写作历时5年,改过11稿,由70多万字演变为如今正式付梓的42万余字,倾注了作家大量心血。小说成功塑造了社会转型期个体私营经济从业者宋怀良、吴佩琳等人物群像,时间跨度从1992年一直到新时代的当下。要了解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作者的个人成长与创作历程。

许春樵实际上有三个文学“原乡”,均在他的中长篇小说中打下深深烙印。一是故乡天长市,一个嵌入江苏省腹地的安徽县级市。二是芜湖市,他在赭山脚下、镜湖之畔的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青葱岁月里与文学结缘,也为日后的

专业写作奠定了基础。三是安徽省合肥市,他研究生毕业后在合肥工作生活至今,合肥也与《下一站不下》中的庐阳相关联。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80年代,年广久创立的傻子瓜子可谓风靡全国,而他正是芜湖起家的。如果说凤阳小岗村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那么年广久与傻子瓜子堪称中国城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路标。《下一站不下》中的创业者宋怀良等人,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年广久与傻子瓜子。

《下一站不下》以平民化的叙事视角、生动细节、悲悯情怀,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后的阵痛和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呈现出宋怀良、吴佩琳等为代表的草根创业者的情感史和心灵史,为新时代文学画廊增添了诸多丰满的人物形象。宋怀良是国有

无线电厂下岗电工,父亲是食堂伙夫;而吴佩琳是国企厂长的女儿,他们结为夫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戏剧性和巨大落差,为后面的情节展开埋下了伏笔。宋怀良与吴佩琳之间的爱情,更多的是吴佩琳对父母爱情悲剧的一种逆袭。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境遇下,两人赌气似地仓促结为夫妻,并在下岗职工云集的五里井社区,开启了跌跌撞撞的谋生与创业之路。他们靠不怕吃苦的勤奋和锲而不舍的韧劲,悟出了经商门道,靠卖墓地挣来第一桶金,创办了装修企业怀琳公司,一时间在庐阳市红透半边天。然而,宋怀良与吴佩琳能共苦,却无法同甘。随着时光流逝,这对曾经生死与共的患难夫妻在经营理念、人生观、价值观、贫富观上的分歧与冲突愈演愈烈,直到艾叶的出现与介入,两人的婚姻危机全面爆发。

许春樵用白描手法,通过大量极具张力的细节和新奇的比喻,冷幽默,解剖刀式地直入人物内心,冷摹出鲜活的众生群像。用作家自己的话说,这次写作是从人与社会的尖锐对峙以及对现实的强烈干预和介入,转向了对人自身的关注——尤其是对我们内心情感的关注、挖掘与抒写。

小说中,宋怀良成了装修公司法人代表后,随着财富的增长和社交圈的扩大,面对无数诱惑,他始终坚守着内心的道德防线。这也许有些令人意外,但许春樵坦言,他不想简单地在金钱与道德之间缔结因果关系——有钱就是罪恶,男人有钱了就道德沦丧。宋怀良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显然与他的人格追求与传统道德观念有关。他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和“江淮好人”的形象,最终在见义勇为勇斗盗贼的泣血壮举中得以“圆满成全”。

下一站不下,再下一站,依然不下,这是宋怀良吴佩琳们不会轻易撒手的人性光芒,也是他们丰富复杂的情感史心灵史的真实再现。

